

雲南志校釋

雲南志校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雲南志校釋

〔唐〕樊 綽 著

趙 呂 甫 校釋

云南志校释
Yunnanzhi Jiaosh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 印张 2插页 375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22 定价: 2.45元

序 言

南诏是唐代云南地区的一个多民族的奴隶制国家。南诏立国的二百七十年间，它跟唐朝基本上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吐蕃、骠国、昆仑国、真腊国、大小婆罗门国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也有着较深的联系。尽管南诏统治阶级运用奴隶制度，并不断吸取唐朝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残酷地剥削奴役境内各族劳动人民，但是各族人民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仍然坚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当地的经济、文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来各族人民惨淡经营云南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天我们要研究云南地区两千年来各族人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南诏史确属一个重要环节，南诏史的探讨是一项决不可忽视的工作。

根据前代史籍书录的记载，唐人撰著的南诏史料，计有韦琯《云南事状》一卷，袁滋《云南记》五卷、韦齐休《云南行记》二卷、徐云虔《南诏录》三卷、达奚洪《云南风俗录》十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窦滂《云南别录》一卷、《云南行记》一卷和樊绰《云南志》十卷等。其中除樊志一种今存外，其余诸书俱早散佚。可以

说，樊绰《云南志》是保存到现在的一部最早最详备和最有参考价值的南诏史著了。

由于书缺有间，《云南志》撰著者樊绰的生平事迹业已莫能详悉，现在仅知他是唐懿宗李温（后改名漼）时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属吏。咸通三年（862）三月，蔡袭被任命为安南经略使，他在赴任的途中，差遣樊绰率领健卒二十人先行潜入南诏军队控制区，调查南诏军事部署的虚实。其年冬，南诏前锋部队进围安南城，蔡袭婴城拒守以待救援。次年（863）正月，城陷，蔡袭阖宗死者七十余人，樊绰的长子樊韬及家属等十四人亦同时陷没。樊绰则乘间携带经略使印信突围泅水逃脱，暂留郡州待命。六月，南诏挥师进取郡州，郡州告急，樊绰复转赴藤州。不久，始奉唐中央政府的命令还归长安。以后樊绰受命任夔州都督府长史。

自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南诏摄政王蒙嵯颠率兵残破西川以后，唐和南诏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到懿宗时，唐政府对于南诏内部的情况已经异常隔膜，确定对待南诏的政策甚感棘手。当樊绰尚在安南城时，他就很留意搜集有关南诏历史和现状的材料。迨寄寓郡州后，他便撰成《云南志》十卷，并委托张守忠转呈朝廷，其《奏疏》说：“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职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奏疏》所说的“去

年”，即咸通四年（863）。除《云南志》正文外，其卷四的第1条和卷十末所附录诸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樊绰所裒集的贞元十年（794）《誓文》、赵昌《奏状》以及樊绰自己的奏疏，这些是属于当代的文献资料；其一是樊绰所节录的《后汉书》、《夔州图经》、《广异记》等有关廛君蛮的史料。前一类，据樊绰在《六诏篇》第9条的按语里说：“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书蔡袭意旨，令书吏写蛮王异牟寻《誓文》数本，并书牒系于车驾上，飞入贼营”云云；又《进献表》里说：“臣今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老处借得故蛮王蒙异牟寻《誓文》一本，安南都护赵昌贞元十年《奏状白》一本……今臣谨录故蛮王蒙异牟寻贞元十年《誓文》及赵昌《奏状白》，随表奏进以上”云云，足见这一类文献都是《云南志》正文呈献以后所陆续进呈的，而非原书的副录。至于后一类资料，据他在《奏疏》中说：“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夔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云云，足见这类资料乃系樊绰在夔州长史任内时始搜得的。唐史馆陆续收到这两批文献以后，就汇集并粘附于全书卷末，这就是第十卷内容特别驳杂臃肿，而与其他各卷编撰体例不一致的基本原因。现在便将这两类资料加以区分并归入《附录》中，以纯体例。

樊绰撰著《云南志》，主要是从唐朝的利益出发，替唐中央政府和剑南道、岭南西道地方政府处理南诏问题提

供可靠的依据。樊绰在书中既谴责了南诏对唐边境的侵占与掳掠，同时也揭露了唐西南边疆“长吏苛暴，恣杀无辜，致令众蛮告冤”，南诏“因兹频来攻掠”等事实。这说明他的记述是比较客观的，并没有以个人恩怨偏袒那一方。这正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云南志》里也记述了南诏奴隶主阶级残酷地奴役压迫境内各部落、部族劳动人民的事实。所有这些记载，都是我们研究唐和南诏以及南诏内部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由于樊志的资料来源多属第一手记录，其所述南中习俗物产又多与内地汉族殊异，特别是山川城邑的命名和方位沿革颇为生僻，因此籀读甚感不易。今即广征旧籍文献，详为校释。

樊绰自定名为《蛮志》，宋以后则有《蛮书》、《云南志》、《云南记》、《南夷志》、《南蛮书记》诸名^①，今从《云南志》一名^②。

樊绰书中所述由于多系旁人提供的材料，且又参考韦齐休、袁滋等人的著作，因而不免有传闻失实考核未周之处。重以明代中叶以后，樊志流传已少，清初四库馆臣始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付梓。以后留意西南少数民族史者又累加翻刻。以致讹夺臆改之处，层见叠出。就中以《琳琅秘室丛书》本搜采诸家校语最称完备，讹误也比较少，今即以为底本。

清沈曾植《蛮书注》虽有荦路蓝缕之功，惜未刊行问世，其详已莫由窥知。李子廉《蛮书考证》残卷虽存，以无缘获读，其考证得失亦无法明悉^③。向觉明先生《蛮书

校注》搜集参考资料之功，实多于校订注释。他如岑仲勉、方国瑜、马长寿、王忠诸氏皆于樊书时有新解，凡此拙撰并择善而从。

为了便于读者翻检和引用樊志正文，各卷都按条文顺序标注了号码。《附录》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研讨南诏史而增添的。

本书的撰著，始自雠校众本，迄于整比誉清，稿本曾经三易，前后断续凡历三十余年。其间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热情关注，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世之治樊书者，幸垂教。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三稿，一九八二年仲夏修改葺事。赵吕甫谨志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西五楼惜阴榭。

注 释

- ① 《南蛮书记》见王应麟《玉海》卷十六《异域图书类》，疑为《南蛮书》与《南蛮记》之误合。
- ② 《文献通考》卷二〇五云：《剑南须知》十卷。巽岩曰：“宋如愚撰。第一、第二卷但编集旧史，拚取或不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尽出唐樊绰《蛮书》。第七卷已下，乃如愚自为之文，及所画计策耳。”知宋人言西南边事者犹甚重樊书。
- ③ 李著仅见于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目 录

序言

卷一	云南界内途程·····	(1)
卷二	山川江源·····	(58)
卷三	六诏·····	(93)
卷四	名类·····	(127)
卷五	六賧·····	(183)
卷六	云南城镇·····	(205)
卷七	云南管内物产·····	(256)
卷八	蛮夷风俗·····	(288)
卷九	蛮夷条教·····	(301)
卷十	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	(311)

附录

- 一 云南志佚文、樊绰奏状及绰所辑有关唐南诏复交资料 ····· (329)
- 二 樊绰所辑有关康君蛮史料····· (355)

卷一

云南界内途程^①

1 交阯城，（校）吕甫按：木芹《云南志校补序》云：“卷一首条纪交阯至安宁途程，而安宁在前，交阯在后，把所谓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事系于安宁城，当然不类，只有安宁城与交阯城互改，才能与文义和史实相符。”今按木说是也，盖此条乃总述交阯、安宁间之里程，下条始分叙两地间各段道里，下条既云“从安南府城……”，此条亦应首言交阯城；上下文例方一致也。今依其说互改安宁、交阯四字。后汉建武十九年，（校）吕甫按：“建武十九年”五字原讹作“元鼎二年”，今依《后汉书·马援传、南蛮传》暨四库馆臣说校改。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②。去安宁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

①袁嘉穀《滇绎》卷一云：“云南之称，在汉仅永昌郡之一县，蜀汉名郡亦在迤西。《隋书·梁睿传》，请置云南西爨等总管，皆非全省之名也，唐乃有以南诏为云南者。《新唐书·南诏传》开元二十六年，册归义为云南王。五诏浸弱，是时未全据迤西地。天宝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是时亦只据迤西地。香山《新乐府》：从兹始免征云南，即指阁罗凤时之云南。贞元十年，册立异牟寻为南诏，盖南诏不愿名云南王也。”

②吕甫按：四库馆臣云：“马援定交阯为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汉武帝纪年，后汉并无此号，盖樊绰失于考据之误。”《后汉书·南蛮传》云：东汉建武“十六年（40），交阯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征侧者，雋冷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彥人诗索

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徼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式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同书《马援传》云：“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式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表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式，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至于马援植铜柱定疆界之地，《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南史·南蛮传》、《通典·边防典》引《林邑国志》及屈璆《道里记》、《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环王传》、《御览》卷七九〇引《交州南外国传》等并谓在林邑南二千里之西屠国北境，凌扬藻《蠡勺编》卷四〇、张镜心《取交记》则谓在思明府（广西南宁）钦州（广西今县）各有铜柱一，并援所植。大抵汉以后好事者慕援远征事迹，竞铸铜柱以广附会，而著录者又各以所知纷为笔记，当以前说为朔。又汉代日南郡治在西卷县，今越南广治西北。九真郡约当清化省。交趾郡今河内地。合浦郡约当广南省。麓冷县今越池，说详（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

2 苴畔城^①，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畔城水陆五十二日程。只计日，无里数。从安南上水至峰州两日^②，至登州两日^③，至忠诚州三日^④，（校）吕甫按：“诚”，《新唐书·地理志》作“城”。至多利州两日^⑤，至哥富州两日^⑥，（校）吕甫按：“哥”，原作“奇”，向达《校注》卷一云：“《新唐书·地理志》安南都护府所属四十一羁縻

州中又有哥富州，当即《蛮书》之‘奇富’，哥、奇形近而讹耳。”今按：向氏未改“奇”为“哥”字，是认“奇”字不误矣，然《唐会要》卷七一亦作“哥”，则此原作“奇”实误，因据改正。至甘棠州两日^⑦，（校）吕甫按：“甘”，《新唐书·地理志》附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作“丹”，又《志》安南都护府羁縻州条作“甘”，疑“丹”讹“甘”是，姑志于此以俟异日考证。至下步三日^⑧，至黎武责栅四日，至贾勇步五日。（校）吕甫按：《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并作“古勇”，贾耽《路程》作“古涌”。贾勇、古勇、古湧皆音同之异写字。已上二十五日程，并是水路^⑨。大中初，悉属安南管系，其刺史并委首领勾当。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川洞离心，疆内首领旋被蛮贼诱引，数处陷在贼中^⑩。从贾勇步登陆至矣符馆一日^⑪。（校）吕甫按：“馆”原作“管”，卢文弨云：“此是馆驿之‘馆’，作‘管’讹，下同。”又云：“召音弟云，此当是馆驿之‘馆’，与下一例。”今按：卢说是也，因改“管”为“馆”，下同。从矣符馆至曲乌馆一日，至思下馆一日，至沙隻馆一日，至南场馆一日，至曲江馆一日^⑫，至通海城一日^⑬，至江川县一日^⑭，至晋宁馆一日^⑮，（校）吕甫按：“晋”原讹作“进”，兹依两《唐书·地理志》改正。至鄯阐柘东城一日^⑯，（校）《补校》云：“‘柘东’，《旧唐书》及《通鉴》俱作‘拓东’，胡三省云，言开拓东境也。《新唐书》作‘柘’，从木，与此同。”从柘东节度城至安宁馆一日，（校）吕甫按：“安宁”原作“甯寔”，卢校云：“‘甯寔’疑‘安宁’，否则下有缺文。”又云：“按下文云‘安宁馆本是汉宁郡城也’，则此‘宁寔’当是‘安宁’。”今按：卢说甚是，《新唐书·地理志》正作“安宁”，因据改正。安宁馆本是汉建宁郡城也。（校）岑仲

勉《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云：“‘汉宁郡城’疑系‘汉建宁郡城’之夺。《华阳国志》四晋宁郡云：‘蜀建兴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为太守，改曰建宁。’”向达《校注》卷一云：“安宁，汉为连然县属益州郡，唐武德初改名安宁县。此云汉宁郡城，疑原文有误。汉无宁郡之名，据《三国志·蜀志》卷三《后主纪》，后主建兴三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治味县，即今宜良。连然亦属建宁，唯非郡城。此处之‘安宁馆本是汉宁郡城也’一语，或应作‘安宁馆本是汉建宁郡城也’，原本脱‘建’字。汉指蜀汉而言。晋世又分南中四郡为宁州，则此处之宁郡亦得指宁州而言。姑识所疑于此。”吕甫按：岑、向两氏说并是，因据增补一“建”字。陈可畏云：“按此处之‘汉’，实指唐朝；‘宁郡城’乃为‘安宁县城’之误。”录之以备参稽。从安宁城至龙和馆一日^①，至沙雌馆一日^②，至曲馆一日^③，至沙却馆一日^④，至求赠馆一日^⑤，至波大驿一日^⑥，至白崖驿一日^⑦，（校）吕甫按：“崖”原本作“巖”，今依卷三第1条校语改“崖”。又聚珍本、鲍本作“巖”，讹。至龙尾城一日^⑧，李宓伐蛮于龙尾城，（校）吕甫按：“宓”原作“謐”，新、旧《唐书·玄宗纪·南诏传》、《通鉴》、《德化碑》、《滇系》并作“宓”，因据改正。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密”，《南部新书》作“𡵓”，则又因密、宓音同，宓、𡵓形近而致误耳。误陷军二十万众，今为万人冢^⑨，至阳苴咩城一日^⑩。（校）四库馆臣云：“按，‘阳’，《新唐书》作‘羊’”。

①原注云：“上音斜，下符差切。”吕甫按：卢文弨云：“苴，钜加切。咩，弥遮切。此‘符差’疑当作‘符嗟’。”又云：“按‘咩’当作‘苴’，从楚姓之苴，其音似羊，当从其俗读弥嗟切，不读徐婢切也。注符差之‘差’有数音，则不当以此为嫌，疑本是‘嗟’字，脱音偏旁耳。唐薛能诗：‘野色出肥苴，乡仪捣散茶；梯航经社宇，烽火彻苴咩。’董衡《唐书释音》：苴，钜加切。咩，弥遮切。皆读平声。”向达《校注》卷五云：“阳苴咩城，《旧唐书》作‘阳苴咩城’，《新唐

书》作‘羊苴咩城’，本书卷一亦作‘苴咩城’。苴音斜，咩符差切。据Hobson-Yobson二〇四页Chobwa条，缅甸语称王曰tsaubwa，泰语作Chao，〈新唐书·南诏传〉所谓夷语‘王’为‘诏’是也。亦曰Chao hpa，乃复合词，hpa之义为‘天’。私意以为‘苴咩’一语，或即tsaubwa，Chao hpa之对音，苴咩城者，王城或京城之义也。郭松年阳苴咩城亦名紫城之说差得之。紫城云者，若后世所云之紫禁城耳。苴咩前冠以‘阳’或‘羊’字，疑为尊称，与马来、占婆、吉蔑、爪哇、得楞诸语中之yang字相同。阳苴咩城译以汉语，或即神京也。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七谓羊于滇中为盛，故太和古城曰羊苴咩城。‘苴’者幼也，‘咩’者幼羊呼母之声也。其说纯是望文生训，不足为据也。”阳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市。

- ②〈新唐书·地理志〉云：“安南经交趾太平百余里至峰州。”又云：“峰州承化郡，下都督府，武德四年以交趾郡之嘉宁置。……县五：嘉宁、承化、新昌、高山、珠绿。”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今日大致考订其地为白鹤。此百余里，〈旧书〉作百五十里，与〈蛮书〉水程二日之记载亦合，然此仅指其治所。至其地至少应当今之山西全省。”马司帛洛〈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云：“峰州处交州之西北，红河两岸，及白河（盘龙江）黑河（李仙江）高原之下流，诸河流域迄于云南之诸羁縻州并属之。其地大约可当十五世纪黎氏时之山西一省，而在今日则包括山西、永安等省。其在红河左岸，则以昔之漏水，今之Song-Ca-lo为界，在右岸则地接交趾，界止何处，今尚未能确定也。”吕甫按：两氏之说相合，则峰州约当今越南永福省与山西之部份，白鹤即今永福省福安镇。又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谓峰州大抵包括白鹤三江口附近，斋江、洮江与沱江谷地下部地区，则又与上举两说微异。

③吕甫按：此登州当即本书卷四桃花人条，卷六安宁镇条之登州。

- ④〈新唐书·地理志〉云：“（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诚州。”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州距峰州百七十里，〈蛮书〉谓距峰州五日程。然百七十里无须五日行也。比较贾耽与〈蛮书〉之路程，其道里总数虽大致不差，然中间距离相符者甚少，疑有臆为分配者。按隶安南都护府之羁縻州有甘棠州，属县一曰忠诚，或即此地。”向达〈校注〉卷一云：“峰州以后，贾、樊二氏路程俱及忠诚州，贾作一百七十里，樊作五日。按越南北圻水道，红河、黑水河、清水河汇于越池。越池旧名白鹤神庙三歧江，亦作歧江，吴承志

《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三《安南至永昌地理考》谓三歧即唐代之忠诚。据《越桥书》及邓钟《安南图志》，元、明时代云南人入交凡有二道，发自蒙自莲花滩及河阳隘，入交以后分沿洮河即红河左右两岸下行，而会于白鹤神庙三歧，更由此至白鹤，以渡富良江。唐代水行，盖亦先至白鹤，由白鹤至越池，然后溯红河正流而上。吴氏三歧即忠诚之说，确实可信。”吕甫按：越池县今属富寿省。

⑤《新唐书·地理志》云：“忠诚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

⑥《新唐书·地理志》云：“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安南都护府》条云：“哥富州，贞元十二年置。”《唐会要》卷七一云：“哥富州、尚思州、安德州，贞元十二年七月，析安南县置。”吕甫按：两日行程不能达三百里，设里数无误，则朱贵殆非哥富之讹，当另为一地之名。

⑦《新唐书·地理志》云：“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向达《校注》卷一云：“《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八，永乐十七年四月壬午，改交趾文振县之甘棠驿隶文盘县。文振、文盘据李文凤《越桥书》卷一，俱隶归化州，即在红河南岸。甘棠驿当即古甘棠州，则唐代自安南入云南道水行溯红河而上，于此可证也。”吕甫按：文振即《越史略》、《安南图志》之“文镇”，为归化州之一县。归化州在今安沛省境，文镇今“文本”。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谓丹棠应在今老街磷灰石矿区，则又在“文本”之北，与向说微异。

⑧下步、贾勇步两地详本书卷六安宁镇条注③。

⑨《新唐书·地理志》贾耽《路程》云：“（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合计《路程》里数应为千六百二十里，或者因安南至恩楼县为陆道，水陆计算之法不同，致有差异。”

⑩《通鉴》卷二四九云：“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考异》云：“《旧纪》琢侵刻獠民，群獠引林邑蛮攻安南府。按《蛮书》寇安南者南诏，非林邑也。”冯甦《滇考》云：“大中十二年，安南经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彝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陷安南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南诏发朱弩直一千助守。然朝贡犹岁至。”吕甫按：事又详本书卷四第21条。

⑪董金鉴《续校》云：“按本书凡地名及人姓名，多用‘矣’字在首，八

卷三十八页，犀谓之‘矣’，读如咸。此‘矣’字音义与彼同。”

- ⑫《新唐书·地理志》贾耽《路程》云：“又八十三里至僊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八云：“通海南至曲江驿，江有流沙甚深，策马乱流可济，稍驻足有陷者。秋水突至，即为巨津。旧有渡舟，恒苦漂溺。”《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五云：“曲江城在临安府治，北临曲江。有二城，一筑于汉，一筑于蒙氏。元为建水州治。……曲江驿在临安府东北八十里，下临曲江，为往来要津。”《嘉庆一统志》卷四七九云：“曲江驿在建水县北曲江故城内。”方国瑜《彝族简史长编》二章四节《参考》九云：“贾耽《路程》，从贾勇步至曲江，凡五百六十八里，又至晋宁凡三百四十里。樊绰路程，从贾勇步至曲江凡六日，又至晋宁凡三日。曲江在通海城南一日，可确定曲江在今曲溪县（以小曲江得名）。”吕甫按：以日行程八十里计之，贾耽五百六十八里之数与本书六日程相差八十余里，殆为两路线之里程也。

- ⑬《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八云：“江川东循星云湖上行，有海门桥，抚仙、星云之通津也。度桥而南，过甸苴关，逾二山，皆宁州地。又循杞麓湖上行至通海县。”吕甫按：《新唐书·地理志》贾耽《路程》云：经通海镇至绛县。《元史·地理志》亦云：“临安路，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立都督府二，其一曰通海郡。”合《利病书》审之，通海城当即今通海县。

- ⑭《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八云：“晋宁东南循松子山涧行，路滨溪水，峰峦如列戟。至河洞铺，登关索岭。西瞰滇池，东观激水，为迤东阨塞。渐下至箴桐铺，逾石关，达江川县。”《读史方輿纪要》卷一一五云：“江川县在激江府东南九十里，西南至临安府河西县百九十里。汉时名‘碌云异城’，蛮名‘易笮’，唐时南诏徙曲旺蛮居此，以白蛮守治之。”吕甫按：此江川县即贾耽《路程》之绛县。《嘉庆一统志》卷四八一云：“绛县故城在江川县。《明统志》，‘……崇祯七年，迁县于江川驿，始建今城，去旧治三里。’”

- ⑮《新唐书·地理志》云：“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〇八云：“由云南治城金马之南，历狗街至大渔村为呈贡境，遵滇池东岸梁山麓至马军铺为归化境，又二亭达晋宁驿，可九亭而夷。”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今晋宁县在江川与云南省会之中间，唐之晋宁县属昆州。《续云南通志稿》卷十四谓旧县土城在今晋

宁县西北五里，又云在今县治西二里，皆与《路程》绛县北八十里，《蛮书》卷一柘东（今昆明省会）南八十里之记载相符。”

- ⑩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云：“善阐为唐宋以来南诏大理之东都，即拓东城也。善阐城址在今省垣南关外，西起鸡鸣桥，东迄聚奎楼外之桑园，南抵南坝，北逾广聚街。……《南诏野史》曰：‘南诏历代称名不同，周为善阐国，蒙苴颂所领。’又曰：‘天竺摩羯国阿育王之第八子蒙苴颂，为白子国仁果之祖。苴颂居白崖，后号昆弥国。年代久远，世次莫考。’则善阐者，即昆明之故国也。……善阐一名，不知所本。余所假定之解释凡二：一为梵语之佛国；一则推定善阐一族实为掸国（Shan States）之苗裔，后与庄蹻兵杂处白崖，乃号昆明。……至善阐为城始于八世纪顷。……《续宏简录》，善阐城际滇池，三面皆水。元为中庆路，梁王驻焉。《张立道传》夏潦暴至，必冒城郭。按省南部地势较低，接滇池处尚在数里外。每值淫潦，易致浸没。至今城则虽遇夏潦，常获安全，此善阐在今省城南之一证。《赛典赤瞻思丁传》，王死葬善阐北门。《南诏野史》，元咸阳王赛典赤墓在县城北门外。《续云南通志》，明学士王禕墓在县城内地藏寺。以现今方位衡之，地藏寺当今城南门外四五里之聚奎楼（即云津桥）附近，咸阳王墓即在寺东南半里地。则地藏寺者当年元故城西门内之一寺也，此善阐在今省城南之二证。明布政使陈文《南坝闸记》曰：‘蒙段时，过春登里，堤上多种黄花，名绕道金稜；河过云津桥者，堤上多种白花，名紫城金稜；今所谓南坝，即紫城银稜之所在也。’按云津桥沿金汁河南下，经玉带河至南坝一段既名曰‘紫城’，是玉带河即当年之城河也，此善阐在今省城南之三证。《云南通志》，东西二寺塔在拓东城中，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大匠尉迟恭韬所建，北距圆通山凡数里，然今二塔俱在城外，而非城内，此善阐在今省城南之四证。”

- ⑪吕南按：吴承志《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三云：“《元志》云，其地（禄丰县）瘴热，非大酋所居。惟乌杂蛮居之，迁徙不常。至元十三年割安宁千户之碌琫、化泥、骥琫笼三处立县骥琫笼，旧属安宁。《方輿纪要》作骥宗笼，云城在县东北山下。又云县东北三十里有陀陵山，本名骥琫笼山，此城跨山脊，疑即安宁所距之龙和，龙与琫、宗声并相近，和即山坡陀之异目，骥琫、陀陵皆由‘龙和’衍改成。别龙和不入邱州，禄丰当如《乾隆统志》说为安宁地。此城界接徒莫祇部，或与昆阳俱属求州。”又云：“禄丰有龙和城，偏北，道所不经。”日本铃木俊《南诏